

# 科技物品、符号文本与空间场景的三重勾连： 对一个鲁中村庄移动网络实践的民族志研究

冯强 马志浩

## 摘要

在互联网特别是移动网络日益普及的背景下，乡村日常生活是如何与信息传播技术发生勾连的？本文以“三重勾连”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科技物品、符号文本和空间场景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并采用民族志方法，从一个村庄的移动网络实践展现新媒介技术与农民日常生活的有机勾连。研究发现，在科技物品层面，智能手机在农村的下沉是物品经济性和技术可供性双重驱动的过程。村民对智能手机的消费实践体现了智能手机兼具共享体验和定制化的技术特性。在符号文本层面，村民移动网络的内容消费呈现出家庭分工模式和权力关系等带来的差异。同时，农村家庭对移动网络的日常消费具有“网络日程表”的特征。在空间场景层面，农村移动网络实践形成了农业生产“不在场的空间”，也带来家庭共享空间的式微与“卧室文化”的形成。对于出国打工和远嫁的村民而言，移动网络具有维系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关系网络与家庭空间再生产的功能。

## 关键词

三重勾连、农村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受众民族志

## 作者简介

冯强，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研究员，电子邮箱：f.q.geduo@163.com。

马志浩，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电子邮箱：redclass@163.com。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多点民族志方法的农村互联网实践及其社会生活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6CXW031）的阶段性成果。

## Triple Articulation of Scientific Object, Symbolic Text and Sociospatial Context: A Case Study of Mobile Internet Consumption in One Village of Eastern China

FENG Qiang MA Zhihao

## Abstract

How does everyday life articulate with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for Chinese rural people with the rapid diffusion of mobile Internet(MI)? Using ethnographic methodolog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ICTs and peasants' everyday life via analyzing MI activities in Jicun (a village in Shandong Province). Adopting the triadic articulation theory, this study carried out analysi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scientific object, symbolic text and sociospatial context. This study found that: (1) In the meaning of the scientific object, the diffusion of the MI in the rural area was driven by the mobile phone's economical trait and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 The MI activities of peasants reveal that the smartphone has technological features of shared experience and customization. (2) In the meaning of symbolic texts, the peasants' content consumption represents differential patterns depending on family division of labor and power relations. Meanwhile, it also reveals some "schedules on online time" in rural families' daily Internet consumption. (3) In the meaning of sociospatial context, the "absent space" in the agriculture was formatted in the MI activities. The shared space in house decayed and the "bedroom culture" occurred. For the working abroad and the married peasants, the MI sustains the relationship of previous *guanxi* based on a geographical bias of blood ties and plays the function of reproducing the family space.

### Keywords

Triadic articulation, Rural China, ICT, Audience studies

### Authors

Feng Qiang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f.q.geduo@163.com.

Ma Zhihao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redclass@163.com.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project entitled "A study on the ICT use and its influence on everyday life in rural China based on the multi-sited ethnography" fund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No. 16CXW031).

近年来,中国乡村社会受到农村城镇化运动和信息化运动等现代化运动的冲击和改造。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网络基础设置的完善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推动着农村网民规模快速增长,“宽带中国”“三网融合”“村村通宽带”等国家工程也为农村互联网发展提供了制度契机。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19)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2.22亿,占比26.7%。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4%。互联网正从中国城市向乡村扩散和下沉。

信息和知识是农村发展和农民赋权必需品的说法日益成为共识(Basu & Banerjee, 2011)。然而在新媒体研究中,农村是一个不容忽视却常被忽视的

地域。目前有限的研究集中在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教育（Grant, France & Hsu, 2000），宽带技术接入对个体经济发展和农村社区满意度的影响（LaRose, Strover, Gregg & Straubhaar, 2011），互联网农村应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Basu & Banerjee, 2011; Chitnis, Kim, Rao & Singhal, 2007）。例如，Basu & Banerjee（2011）在印度的实地研究发现，互联网技术为农民获取农业种植信息提供了便利，提升了生产的质量和数量，这背后体现了互联网的赋权效能。

国内农村互联网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方面：一、城乡数字鸿沟研究。涉及城乡数字鸿沟的测量（刘骏，薛伟贤，2012）、现状（陈刚，张卉，2009）和对策（杨蓓蕾，2006）。二、农村居民互联网采纳及使用行为研究（刘娟，叶敬忠，2010；赵靳秋，郝晓鸣，2006）。三、互联网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包括农村电子商务、“互联网+”下的农村发展等。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对互联网与农民日常生活、农村变迁等方面的经验研究依然缺乏。如Oreglia（2015）所言，在中国农村，农民以不同方式界定、理解并展开上网实践，然而相关研究却少之又少，无论是采用定量、定性还是混合方法的研究。

另外，新媒体研究也面临理论范式转换问题。首先，目前新媒体研究存在非理论性、缺乏历史感、研究面窄、以变量为导向的问题（魏然，2015）。牛津大学教授威廉·达顿（Dutton, 2013: 11）也指出，新媒体的真正预测变量并非媒体科技，而是广义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状态。其次，中国社会的主体—社会中下阶层已经成为新型传播工具的制造者、管理者、拥有者，“中国的社会信息化过程已由90年代精英垄断的局面进入到更广社会范畴内信息中下阶层和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紧密结合的新阶段。”（邱林川，2008）

本研究探讨农村居民以智能手机为技术载体的移动网络的日常消费实践，考虑到新媒体定量研究较多关注个体层面的心理和行为变量，而对个体背后的动态生活经验、家庭权力关系和具体社会场景重视不够，本研究采用质化调查路径，并以媒介技术的“三重勾连”（Triple Articulation）理论来考察移动网络实践与农村社会场景的复杂勾连，藉此理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技术对农村传统社会的冲击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变迁。

### 一、从双重勾连到三重勾连：理论提出与研究实践

“双重勾连”最早起源于语言学家安德鲁·马丁内特（Andre Martinet）的自然语言分析，他认为语言的形态和语音以及两者的相互联结在意义构建方面都非常重

要(Silverstone, Hirsch & Morley, 1991)。其在媒介受众领域得到使用归功于英国媒介研究学者罗格·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他在著作《电视与日常生活》(*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中分析电视与家庭日常生活的关系时对双重勾连理论做了具体阐释。Silverstone(1994: 83)指出:

电视与家庭发生双重勾连,电视技术的重要性依赖于它作为物品(object, 机器本身)和作为媒介(medium)的挪用特征。作为物品,电视因为其美学和功能属性被购买和整合入家庭,它在家庭的公共或私人空间中展示或隐藏,被集体或个人化的使用。作为物品,电视既是全国和国际传播网络的组成元素,也是家庭挪用(domestic appropriation)的象征。作为媒介,电视通过节目的结构和内容,同时通过对公共和私人领域的中介化,把家庭成员引入公共世界并共享意义,并为私人式家庭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原材料。

Silverstone和Haddon(1996: 62)认为,媒介技术的意义建构体现在两个相互依赖的层面,即作为物品的意义及文本和传播形成的信息的意义。双重勾连强调媒介既是物品又是意义的传达者。技术物品的生产、营销和采纳话语及实践均构成第一层勾连。第二层勾连则涉及对媒介传播的符号或文本的接收与解释等,即意义的勾连。在电视观看中,也涉及座次模式、谁观看、和谁观看,谁选择节目以及观看中讨论的内容(Morley & Silverstone, 1991: 152)。双重勾连理论的启示在于,在媒介消费研究中,既要关注媒介作为物品的创新扩散过程与家庭或个人的驯化过程,也要研究媒介内容在日常消费实践中所产生的文化意义。

双重勾连理论在1990年代提出后,引起了不少受众研究学者的兴趣。例如,Haddon和Silverstone(1996)对低龄老年人的媒体使用展开研究,讨论了电脑和电话的个人花费、使用分配和专门知识。研究也分析了内容层面,包括与谁通电话、通话频次和内容等问题,也涉及媒介行为的跨时间自传式陈述。郭文平(2014)探讨了网络新闻消费的文本符号维度与科技物质维度以及两者的交互影响。在科技物质层面,网络新闻具有基础科技、内容再生产和时空延伸等物质特性。在文本符号层面,要注意网络新闻消费的互文性特征。根据双重勾连理论建构,论文区分了五种不同的网络新闻消费类型。

然而,双重勾连研究也遭遇了困难,它在学科和方法论等方面都存在挑战(Livingstone, 2007)。首先,作为一个起源于语言学的概念,双重勾连也常常用于汽车制造等理工科领域(Takenaka, Bando, Nagasaka, Taniguchi & Hitomi,



2012; Taniguchi & Nagasaka, 2011)。其次,学者往往倾向于研究媒介文本意义,但对作为内容消费的(技术)场景选择性失明(Courtois, Verdegem & De Marez, 2013)。最后,双重勾连在实证研究上依然匮乏,一些所谓按照双重勾连架构的经验研究也不理想(Livingstone, 2007)。

英国媒介学者玛伦·哈特曼(Hartmann, 2006)在批判性地分析了双重勾连理论的研究实践后,在2006年发表了《信息传播技术的三重勾连:作为技术物品、符号环境和个人文本的媒介》(*The triple articulation of ICTs. Media as technological objects, symbolic environments and individual texts*)一文。在她看来,媒介消费研究不仅要延伸至双重勾连理论,也要回归三重勾连。实际上,早在1996年,Silverstone和 Haddon (1996: 74)便提出了“三重勾连”概念,涵盖技术之物、符号场景和节目信息三个维度。但某一维度经常在既往研究中被忽略。Hartmann (2006: 96)认为,三种维度都需要被考量,不仅包括使用、参与的总体观念,也包括个体的交流实践、个体节目、个体的网站、文本信息等等。这种范式转移来自于媒体景观的变化。

“三重勾连”理论提出后,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响应。Courtois等(Courtois, Mechant, Paulussen & De Marez, 2012)用“三重勾连”理论研究了中学生的媒介消费情况。文章区分了作为物品的媒介(第一重勾连,例如电视、电脑),作为文本的媒介(第二重勾连,例如歌词、游戏、视频片段)和作为场景的媒介(第三重勾连,例如单独在卧室的场景,和家人在客厅的场景等)。并分析了作为物品的媒介如何进入家庭,谁来购买,注重媒介的哪些属性等。在2013年,Courtois等(Courtois, Verdegem & De Marez, 2013)进一步总结了媒介消费的双重勾连与三重勾连的区别与联系(图1)。

“三重勾连”理论的提出与研究实践具有独特意义。它弥补了过往研究重视媒介文本和技术,而相对忽视媒介消费的社会和空间场景的不足,或者说克服了把媒介技术与使用场景不加区分地杂糅在一起讨论的缺陷。实际上,家庭或个体的媒介消费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社会模式和实践场景。媒介把外界信息带入个体的家庭、社区和社会网络,但信息并非在社会真空中落地(Rimal, Chung & Dhungana, 2015)。媒介化的信息在遭遇因信仰、价值观和社会语境而变动的地方环境时会产生诠释性折射(Gunther & Schmitt, 2004)。也如潘忠党(1996)所言,传播技术必须通过采纳和规范,并再生一个文化的符号表述形式和常规而成为“传播媒介”,并因此成为社会存在与变化以及个人社会化并实现个体社会认同的工具和资源。在此意义上,农村移动网络实践并非是单纯的新技术在农村得到采纳和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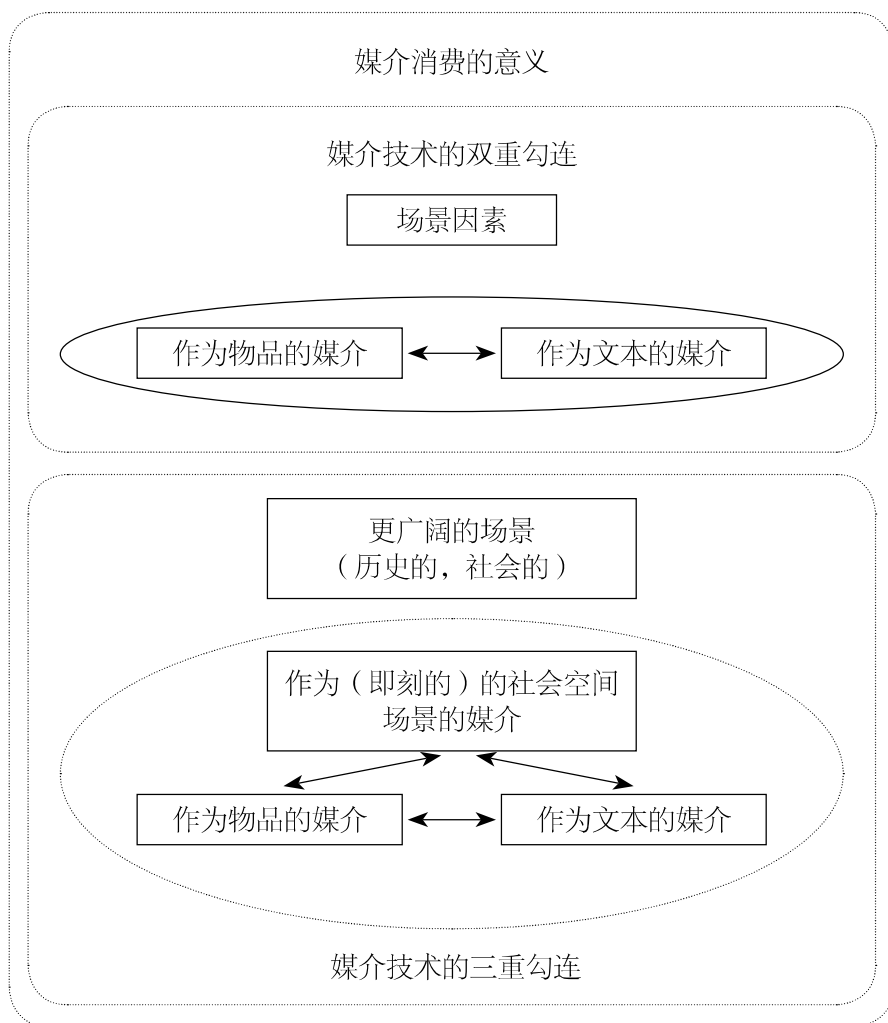


图1：双重勾连和三重勾连的概念框架图

散的叙事，也并非农村受众如何消费网络内容并产生意义的文化活动，而是移动网络与农村社会场景和农民日常生活展开持续互动和相互建构的过程。

## 二、调查路径与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民族志的调查路径，主要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档案查阅的方式，去观察移动互联网的农村实践。民族志研究强调叙事与修辞，注重深描个案，并具有阐释主义、历史主义等取向。对农村动态、复杂和多元的生活场景，民族志研究路径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本研究选择山东省中部地区某农村（此后简称“吉村”）作为田野地点，主要有以下考量：第一，互联网在中国农村发展并不均匀，但在东部沿海省份更为普及，以其村落作为调查地点，可以提供相对丰富的材料。一叶知秋，可以窥测中国农村互联网的实践图景。第二，吉村是本文第一作者的故乡。“家乡的田野”是做

民族志调查的重要路径。不少民族志经典著作都是基于学者在自己家乡的研究，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等。“家乡的田野”也有助于作者借助社会关系网络收集陌生人所无法获得的资料，也更容易辨别资料真伪。<sup>1</sup>

吉村位于山东省中部X县城北部，距离该县城中心城区约30公里。吉村地形以平原为主，方圆约3平方公里。农作物以小麦和玉米为主，交叉轮种，一年一熟。目前共379户，户籍人口1375人，在该镇52个自然村中人口规模列第7位。吉村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其中60岁以上村民约210人。在户籍人口中，冯姓村民约1/3，魏姓约1/4，另有郭姓占1/5，另有王姓、梁姓、刘姓、李姓等，均有10余户。目前平均每户约3.5口人。大多数村民以种植和贩卖蔬菜为生，小部分从事蔬菜运输、开出租、建筑工等职业。从地形、人口、宗族、职业等可以看出，吉村是一个华北平原比较典型的传统型村庄。

我<sup>2</sup>主要利用2016年1月至2017年8月的假期时间在吉村做调查。在调查中，也根据结构化问卷对每户家庭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比如家庭收入、人口数、年龄、职业、家庭现代化设备（冰箱、空调、汽车等）与价格、手机品牌与价格、上网时间、内容等。根据资料饱和情况，我共访谈了不同结构类型（年龄、职业、收入、家庭人口数等）的家庭共计61户。我添加了逾百名村民的微信或QQ，也加入了他们的各种微信群，包括农村日常工作群、蔬菜种植交流群等，以了解他们移动网络的日常实践。

### 三、研究发现

#### （一）第一层勾连：作为物品的智能手机

##### 1. 物品经济性、技术可供性与智能手机的乡村下沉

智能手机在农村的消费首先是一种新技术在农村被采纳和扩散的话语和实践。创新扩散是技术采纳的重要理论框架，罗杰斯（Rogers，1983：15-16）曾经辨识出五种构成采纳决定过程的感知因素：相对优势、兼容性、复杂性、可尝试性和可观察性。智能手机在农村的使用和扩散同样受到以上因素的影响。

然而，这些因素在农村移动手机扩散中的影响并不能等量齐观。智能手机与村民既有的习惯、观念等方面兼容性很低，同时在使用复杂性等方面远逾普通手机。吉村村民在采纳智能手机时，首先是出于经济成本的考虑。很多村民购买智能手机首先是看重它在远程通话方面的经济、实用功能。通过微信软件可以实现免费

的双向语音和视频畅聊，便可以每月节省一笔数额不菲的手机通讯费。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村民说：“晚上用微信跟姊妹们聊天，跟闺女聊天，不花钱。不然用手机打电话，一个月包月200分钟，但400分钟都不够用的。”

智能手机的普及也与其日益低廉的价格有关。吉村村民用的手机价位大多在一两千元左右。品牌集中在OPPO和vivo两种手机，受访村民中，使用这两种品牌的村民占到八成。而使用苹果手机的村民少之又少，这是因为动辄逾5000元的苹果手机远远超过了普通村民的消费能力。我到村民庆辉家调查时发现，他们一家三口都是用的OPPO手机。这些手机都是在隔壁县城购物广场买的。“那里卖手机的店多，竞争激烈，容易砍价。一千三、四的手机你可以砍到一千一。因为卖家多，他不卖就走，买别家的。”

除了物品的经济性外，智能手机的技术可供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也是其在农村迅速推广的因素。在传播研究中，可供性常被用于考察媒介技术的质量、特征或线索（cues）。技术可供性突出技术的物质品质，强调媒介部分地独立于受众使用过程（如沟通、中介和情感表达）之外的属性（Nagy & Neff, 2015）。智能手机的可供性体现在人际交往、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各方面的技术优势。相比较电视、普通手机、电脑，智能手机整合了传统媒介的多种功能属性，并具有便利性、互动性、移动性、即时满足等特征。

在吉村调研中，无论是儿童还是老人，都对智能手机的技术可供性有着直接的体验和认识。正读幼儿园的5岁<sup>3</sup>小女孩梓轩喜欢用美颜相机拍照片。“因为拍的照片可以带很多卡通图片。”她觉得手机比电视好玩，“手机上，你愿意看什么就可以看什么，还可以玩游戏。电视上节目少。”65岁的天平大爷则认为：“手机上网是好事。这个手机对于种蔬菜的帮助很大，有了这个，信息灵通。比如蔬菜价格，一天发一回，我们就知道行情了。有网络的即时交流，不耽误时间，很方便。”

总体来说，对于吉村而言，手机首先是作为消费品（as consumer objects）和作为实物的物品（as material objects）。农民对智能手机的技术体验主要在于它是价格更为低廉、通讯更为便利、功能更加多元的通讯工具。物品的经济性和技术的可供性也使得智能手机的农村下沉之路变得越来越畅通，智能手机在乡村的采纳和技术实践也使得乡村卷入信息化和全球化的现代话语之中。就此而言，智能手机作为技术物品的第一层勾连也具有勾连乡村与城市、地方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结构性意义。

## 2. 定制化兼具共享体验的智能手机

在Courtois等（Courtois, Mechant, Paulussen & De Marez, 2012）看来，电视是共享的媒介，家人可以一起观看，而电脑是高度个体化的媒介，电子邮件和照片文件夹等也都意味着电脑的私密性和个体性。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设备主要是服务于个体，但也能提供共享体验，例如，一起用手机听歌等。

智能手机具有多面向、定制化的技术体验，这体现为智能手机可以下载不同的应用软件，满足不同消费者的特点需求。在吉村，既有经常应用多种不同类型APP的村民，也有仅用少量APP的村民。55岁的天瑞用的是一款小米手机。他只会用微信和今日头条。用微信和在异地工作的子女对话，用今日头条了解每日新闻。

在吉村很多家庭，智能手机并非个人物品，而是和冰箱等设备一样是家庭公用的技术物品。在调查中，我常常看到夫妻共用一部智能手机的场景。与城市更高的流动性不同，很多村民生活范围就是方圆数里的村庄，不是田间地头就是家里，夫妻没必要购买两部智能手机增加消费成本。例如，村民胜利之所以要购买智能手机，是因为他儿子志明中专毕业后去了成都当兵，要经常视频联系。胜利的老婆今年48岁，小学文化，她并没有智能手机。谈及为什么不买，她的理由是不会用、也没时间。他们一起通过微信和志明视频聊天。“一般就是打开网络跟志明聊天，我就喊她过来一起看。”胜利说。

在调研中，我也屡屡遇到农村孩子们一起用手机在卧室或客厅玩游戏“王者荣耀”的景象。这往往是一个拿着手机玩游戏或看视频，其他几名儿童围观。尽管不少未成年子女也有手机，但这些手机大都是父母淘汰下来的，不能玩网络游戏或者性能不佳。同时，父母也会限制子女使用手机，这也迫使他们去和其他玩伴一起体验游戏的乐趣。另外，在玩游戏上，有的儿童更“在行”，也往往引起其他孩子的围观。以上案例都说明了在乡村中，智能手机技术具有共享体验的特征。

## （二）符号文本消费的第二层勾连

### 1. 文本消费类型与内容阐释

在受众研究中，电视内容消费及背后的结构模式常常被讨论。日常生活中的媒介使用不仅涉及具体节目的观看，也要分析观看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模式。一些学者在电视与村落日常生活调查中，也分析了村民的节目消费内容和习惯，以及背后的家庭权力关系（约翰逊，2000/2005：146-169；郭建斌，2005：141-195；金玉萍，2010：166-204）。

宝忠家对智能手机的日常使用可以视为吉村家庭移动网络内容实践的一个缩影。宝忠一家三口，以种植蔬菜为生。36岁的他刚买了一部2100元的OPPO手机。因



为种植蔬菜，他用微信加入了不少推广销售化肥和农药的微信群，比如：润果多肥效交流群、苦瓜包装专用膜群等。他上网主要是玩游戏、看影视剧。他喜欢看枪战片，最近在看电视剧《绝密543》。时值盛夏，天气炎热，他每天会上网3-4个小时。

宝忠老婆用的vivo手机是去年在镇移动营业厅交话费时赠的，她手机上的应用软件包括微信、农村淘宝和全民K歌等。她喜欢用手机淘宝购物，有时候一个月要花掉一两千元，买些衣服、鞋子和方便袋等等。由于13岁的儿子浩然马上读初一，她用微信很重要的目的是关注儿子班级的家长群。她也给我看了家长群里的各种通知。她认为手机非常方便，但对孩子没有好处。她说：“老师不让玩，天天开家长会的时候强调。让家长管得紧着点，别玩手机别上网。之前给他买了步步高平板电脑，2500元，现在都不用了。”

儿子浩然所在的班里40多人，他本次期末考试总成绩是第15名。由于暑假后马上升入初一，宝忠夫妻俩担心他暑假沉迷手机不学习，便给他报名了邻村私人举办的补习班，同时严格限制他上网时间和内容。浩然在一年级时就有了个人QQ，但没有个人手机的他平常主要用母亲的手机上网。他最近用手机“爱奇艺”平台看“TFBOYS”主演的电视剧《我们的少年时代》。

宝忠一家的移动网络消费实践是吉村家庭结构和传统分工模式下信息传播技术消费实践的缩影。作为一家之主，宝忠需要用微信加入某些蔬菜交流群和化肥农药推销群，及时和同行交流蔬菜价格、种植情况。同时，他玩游戏、看枪战剧等内容消费，都体现出成年男性的内容偏好。而宝忠妻子对微信的使用，特别是对家长群信息的动态关注，则体现了作为母亲的责任。同时，她经常用手机淘宝购买家庭日常消费品等，也体现了传统乡村“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未成年的浩然没有个人手机，他的上网时间和内容受到父母的严格控制。家庭的微观权力关系，例如父母对子女的日常规制，也反映到子女网络消费实践过程中。

另外，节目内容的消费也涉及真实和虚拟间的差异，同时也会有很强的代入心理。即将就读小学六年级的浩旭经常用手机网络看动画片《晶码战士》《京剧猫》。“我妈不在家，我就用我爸爸的（手机）。”谈及观看心理，他觉得“《晶码战士》挺好看的，挺冒险刺激的。我也想像他们那样开着飞船去旅游。”他比较喜欢里面的人物“龙炎”：“他有方向感，冒险精神。不过有时候比较鲁莽。”他不喜欢里面的“魔兽”，“因为他可以污染水源，吃了中毒身亡。容易让某种东西变异。老是抓人质。”对于动画片《京剧猫》，他很喜欢里面的角色“白糖”，“遇到事情他从不慌张，就算自己东西碎了，也是带着微笑上路。他口头禅是只要

有信念，就一定会成功。”他不喜欢里面的“武崧”，“他们晋级后，他是最弱的，并且嫉妒心强，完全失去了信心，稀里糊涂加入了黑暗的阵营。”

## 2. 内容消费实践：自传式陈述与网络消费日程表

杨国斌（2017）提出“互联网深度研究”的可能性，“互联网深度研究”强调人的经验、历史性，以及注重对理论与描述、深描与浅描的平衡，并注重互联网与普通人的经验和社会实践。在杨国斌与吴世文（Yang & Wu, 2018）的《追忆中国互联网站的似水流年：激情、社群和青春》（*Remembering disappeared websites in China: Passion, community, and youth*）一文中，也可以看到网络消费实践与个体生命经验间发生的勾连与可能性。

我以“琪琪的故事”为例，来说明一个农村少女的爱情体验与想象是如何和互联网实践互动的。琪琪是吉村一个20岁的青春漂亮的女孩，她从个体恋爱经历的角度讲述了她接触互联网的历史和生活实践。在小学四年级时，她便央求父母给她买了组装电脑。那时候，她主要是用QQ和同学互动聊天，并在QQ空间发表一些动态、图片等，再就是浏览一些帖子，看一些爱情读物等。这让她懵懂地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后来，在读初三时，她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并认识了初恋男友张欣宇。俩人经常用QQ进行互动，并在空间发表自拍照、游玩动态、交往日常、恋爱心情等。但是俩人的恋爱遭到琪琪父母的坚决反对。因为两人年龄太小，同时也担心影响学习和成长。尽管平常难以见面，但两人经常用手机和QQ互诉衷肠，并在QQ空间等平台发布“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帖子，例如：“张欣宇青春荒唐我不负你”。这些内容引起了好友们的围观、点赞和评论。2013年冬天，父母感觉无法管束琪琪，把她送到省会某戒网瘾戒早恋的封闭式教育学校。“当时把手机啥的全部没收了。他电话联系不上我，也找不到我，还去我家要人。”该校是私人机构，以戒网瘾和早恋而知名。在该学校呆了3个月后，琪琪出来依然如故。不久后，她来到县美容院上班，每月工资3000多元，但主要是自己花，手机也是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尽管双方父母都不再阻拦他们的恋爱，她和欣宇的情侣关系却也没再持续多久。“他管得我太严了，我和其他朋友一起吃饭，他也不让我去。后来我们大吵了一架，就分手了。”琪琪又谈了一个男朋友，但半年后又分了。她在朋友圈或QQ空间经常分享一些关于人生和爱情的言论，以表达自己的爱情观和生活观。例如：

为什么要努力

因为我喜欢的东西都很贵

我想去的地方都很远  
我爱的人超完美

作为记忆的“元中介”（meta-agent），媒介不仅改变了事情被记忆的方式，成为承载集体记忆最常见的场所，媒介本身也构成了记忆的一部分（Neiger, Meyers & Zandberg, 2011: 11）。在琪琪的个案中可以发现，对网络和手机的消费和在线实践深深内嵌入个体的成长和爱情体验，并构成了个体生命的记忆。在“琪琪的故事”中，她的恋爱经历、个人成长与对QQ和手机等技术的消费实践密不可分，形成互相型构的记忆。

另外，Livingstone（2007）指出，家庭成员时间表与节目类型形成交叉，形成家庭时间、“我”的时间或国家时间（重大媒体事件）。今天人们的时间常规也体现在网络实践上，比如有人习惯是每天早晨喝完咖啡、抽完烟后才开始查看邮件，没事就关上电脑。晚上回家等儿子睡觉后，才浏览网络新闻（Bakardjieva, 2005: 149-150）。为体现网络实践如何内嵌于家庭成员生活日程，我以正读初三的女生淑莹的讲述为原材料，来记录在夏季的普通一天，吉村一个普通家庭的移动网络内容实践。

我早上7点多起床，收拾一下家，打扫一下卫生，八九点开始玩手机，先把QQ群里的内容看一遍，然后再找同学聊会天儿，之后再去微信看看消息记录，找朋友聊聊天，然后看点腾讯新闻，看看有什么新鲜事儿，最后再看点儿小说，就到了中午了，我就开始做饭，然后就吃饭，吃完饭再看会儿消息，然后就睡觉，我大概四五点再起来，然后打开QQ，看看消息、记录，聊聊天儿，和朋友聊聊家常话，八卦点别人的事儿，然后再去微信看看，看看消息，再和同学聊聊天，然后去芒果网看点电视剧或者是综艺节目。到晚上7点多的时候做饭，吃完饭再出去玩会儿，散散步，再回来健身，然后听着歌和同学聊天，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睡觉。

爸爸一大早出去干活，上午10点左右回家，然后开始在网上玩游戏，主要是上网打牌，然后中午吃完饭睡觉，下午去干活。晚上回来的时候，看看微信里的消息，再抢点红包，然后，吃完饭出去玩。回来的时候，在网上看点小段子、小视频或者新闻，然后就睡觉了。

妹妹一般是看电视，中午爸爸睡觉时，她就把手机拿过来玩儿玩儿。主要是看看她学校那个微信群里的消息。然后去“学乐云”做点作业，然后有时候还逛一下淘宝店。再就是玩玩游戏，她主要是玩她们那么大的游戏吧，有时候玩

“汤姆猫酷跑”，还有“海滨消消乐”。

妈妈一般是在爸爸出去把手机留在家里的时候，她拿起来玩一玩儿。主要是看看群里的消息，然后看一下段子，或者是好玩的视频，看点儿新闻。

网络媒介消费也重新塑造农村家庭的时间安排和生活习惯，形成基于网络内容的“网络消费日程表”。在“淑莹家的一天”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家庭成员不同的内容消费习惯，也可以看到家庭成员在网络消费方面的时间议程。这种时间议程与家庭成员的工作内容、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位置等紧密关联，例如淑莹的父亲白天要去农地干活，所以网络消费是利用中午或晚上在家的時候。母亲没有手机，只能在父亲使用之余用进行网络消费。而淑莹因为是在暑假时间，可以长时间无监督地使用手机。移动网络的内容消费嵌入家庭权力结构和时间议程之中。

### （三）空间、文化和社会场景的第三重勾连

媒介实践的场景既包括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例如，公共汽车、广场，也包括共享的家庭空间（shared domestic space），例如，客厅、阁楼。共享空间跟家庭社交活动和经验共享行为有关。还包括私人空间（private space），例如，卧室、书房。私人空间主要用于日常生活的逃离或者休闲。尽管不同群体有媒介内容实践的空间偏好，但并不意味着某种媒介天然地与某种场景相勾连（Courtois, Mechant, Paulussen & De Marez, 2012）。

#### 1. 移动网络与农业生产空间的延伸

针对手机和移动网络，Vorderer等(Vorderer, Krömer & Schneider, 2016)提出了“永久在线、永久连接”（permanently online, permanently connected）的概念，挑战了过去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的研究视野。连接上移动网络的手机无时无刻不在被使用。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手机实践发生于每个场景，既包括客厅、餐桌、卧室和厨房，也包括行走的路上，甚至是在干农活的时候。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移动网络改变着吉村既有的农业生产习惯和管理方式。不少村民的手机上都下载了“种好地”“农医生”等讲授种地、施肥、农作物治病等内容的应用软件。47岁的村民万易经营着村里的化肥和农药商店，他给我简要介绍了这两款软件：

“种好地”的专家基本都是本地的，也有一些其他地方的，“农医生”的是全国的都有，包括四川、甘肃的。这些软件定时发布一些农药信息，解答病害、虫害、植物生产情况等。什么菜、什么病，看专家怎么回答。

智能放风机在吉村大棚蔬菜种植中的应用也是一个典型案例。由于吉村多数家庭以种植高温大棚反季节蔬菜为生，大棚温度调节非常重要。以前主要靠人工方式，在大棚温度过热的时候，打开棚顶塑料缝隙。等到气温下降时再关上。但在遇到大风、雨雪等天气，就要根据天气情况和棚内温度随时关注。这种人工方式自然是费时费力。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蔬菜种植和管理也有了新的方式。很多农户在大棚里安装了可以远程控制的智能放风机。用手机APP便可以实时查看温度情况，并可以自动关风和放风。村民利波一家种植了一个长达120米的大棚，装了5组放风机，花了5000元。他说：

智能放风机在新式大棚都安装了，以前放风的时候很麻烦，特别是刮风下雨。现在可以通过手机网络智能控制，非常方便。你也可以手动控制温度。大棚温度如果过高，对方会来电话。现在更高级了，可以使用流量来收到信息提醒，更便宜。

## 2. “双重门”：家庭共享空间的式微与“卧室文化”的形成

Livingstone（2002：119-120）观察发现，从1950年代以来，青少年日常生活中存在两种显著趋势，其一，前门（the front door）把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分离，前门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变成了一种严格的藩篱。其二，卧室的门（the bedroom door）把青少年的个体空间剥离于家庭和公共生活。

实际上，“双重门”——房屋正门和卧室之门的象征意义也体现在互联网时代。在调查中，很多人谈及，现在空余时间喜欢走街串门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了智能手机后，很多村民变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玩手机。60多岁的桂英大妈便感慨：“现在网络大兴，吃的喝的玩的用的，都可以通过网络买到了。大街上都没有了。去邻居家，他们都低着头玩手机。本来走门子，不就是几个人拉拉呱嘛。现在倒好，都没有人跟你聊了。”

管成云（2017）调查发现，互联网进入乡村后，网络新媒体逐渐主导着儿童的媒介时间，电视受到冷遇。同样，智能手机在进入农村后，电视和台式电脑逐渐被弃置。以客厅为代表的家庭共享空间的形成依赖于电视媒体的普及和使用。在前互联网时代，多数家庭的晚间生活是饭后一起看电视、讨论电视节目、剧情和人物等内容。然而，这种家庭文化在互联网时代特别是移动网络时代逐渐式微。不少吉村家庭的电视机屏幕都蒙上了一层尘灰，显示出许久未用的痕迹。这些景象在反映出网络设备对电视等媒介替代的同时，也意味着家庭场景与文化的变迁。



一个夏天的夜晚，我走进46岁的村民万宇家调研。他负责给别人开大车，刚长途奔波回到家中。他从青岛装上土豆，开车数千公里到四川自贡县卸货，翌日下午到西安拿上零单包括快递等，然后开车到榆林卸货，再装煤回到山东昌邑。“5天一个囫囵觉都睡不着。”他妻子每天凌晨四点钟出门干活，去给蔬菜商装蔬菜，一直到中午一点左右。装一斤蔬菜可以赚3分钱。

儿子诚诚在鲁东大学读大三，暑假回到吉村。当我走进他的卧室时，空调冰凉的冷气与客厅燥热的温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正聚精会神地玩游戏“梦幻西游”。他说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上网玩游戏了。“一玩玩一天。在学校时候，没课就玩，特别是周末玩。”手游他还玩过“阴阳师”。他觉得不玩游戏会很无聊，也经常跟同学聊游戏。“没事就聊，聊玩到什么水平，坑了什么队友之类的。”

Bovill 和Livingstone（2001）认为，青少年的卧室是媒体和个体认同交汇（intersect）之处。“卧室文化”的出现意味着儿童和年轻人花费大量的休闲时间用在大众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上，并通常是在他们的私人空间而非家庭公共空间中展开活动。Larson（1997）研究发现，青少年更喜欢单独打发时光，这种状态跟短期的幸福感等积极情感都存在正相关关系。在诚诚个案中，通过卧室，他不仅创造了一个独享的个体娱乐空间，同时也通过手机创造出一个虚拟的、超越物质空间的、以游戏话题链接的同辈共享空间。在卧室里，一方面避免了客厅里客人来来往往的干扰，也可以逃避在父母的“凝视”下玩游戏的压力。

在移动网络折射出的家庭权力结构中，并非存在单一的控制与摆脱的权力关系场景。网络和自媒体的普及也为代际甚至代内的文化反哺提供了条件（陈云松，朱灿然，张亮亮，2017）。周裕琼（2014）研究发现，在新媒体知识方面，子女对父母的反哺多于父母对子女的哺育。另外，文化反哺程度越深的家庭，亲子关系越和谐，子女在父母眼中地位也越高。在调研中，我常常看到子女向父母分享自己对智能手机和移动网络使用的经验，而这种家庭中，亲子关系也往往比较和谐。

### 3.关系维系与家庭空间再生产：出国的、打工的和远嫁的

新媒体技术对草根群体的赋权效果已经被广泛论证。丁未和田阡（2009）对深圳的来自攸县的出租车司机调研发现，手机和电脑等新媒介技术的使用有利于该群体共同抵御风险，但更多的是维护既有的地缘和血缘关系，很少用于拓展新的社会网络，从而形成基于新媒介技术而形成的“流动的家园”。

在吉村，我们也发现互联网络复制了血缘和地缘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村民爱民的女儿娜娜几年前去韩国釜山打工，他们会通过远程视频聊天。“刚去的一个

月，我们和她视频，看她眼睛通红想掉泪，知道她去那里想家。俺们不会视频，都是强或者刚（二儿子）给俺打开。问问她生活方面、工作方面的情况，吃什么，吃得好不好，工作累不累，不要太想家。每次都聊个把钟头。”娜娜打工回来后很快嫁到临县，平常经常通过微信或电话跟父母聊天。

55岁的村民玉凤二十多年前从云南嫁到吉村。平常由于路途遥远，这些年来仅回去过两次云南老家。如今有了电脑和手机后，她学会了用网络跟云南的母亲、兄弟、妹妹聊天。云南老家里并没有网络，他们就在邻居家上网。一聊大半个小时。“俺娘经常问啥时候回来呀？娘都七八十岁了，再不回来就见不到了。”玉凤感叹。

对于打工者而言，网络更是他们和父母或妻儿保持交流的重要手段。村民庆国是一名卡车司机，给运输公司开车。他最近三四个月都比较忙碌，经常是晚上开车、白天睡觉。他爱人担心他晚上安全，便通过微信在晚上时候和他联系，提醒他注意安全。他弟弟庆辉在外做砖瓦匠工，工作地点不固定，所以也经常用微信跟在家的妻子和女儿聊天。

#### 四、结论与讨论

对于面积广袤的中国农村而言，农村移动互联网实践既是国家主导下的农村信息化运动的重要部分，又通过互联网实践卷入了既有的市场、国家和全球化系统。移动网络的农村实践改变了农村文化和生活场景，电脑、手机、宽带和路由器等构成的乡村信息网络在重构着村民的生活空间、交往方式、时间分配、人际网络、亲子关系和家庭文化，也在改变着农业生产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方式。携带移动网络的智能手机等新媒体技术在吉村的接入、推广和使用的实践和话语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乡村结构变迁的“达芬奇密码”。本文借鉴“三重勾连”理论，以民族志为研究方法，调查了一个村落的移动网络与农村社会的有机勾连，这种勾连建立在移动网络作为科技物品（第一重勾连）、文本内容（第二重勾连）和社会空间场景（第三重勾连）的不同面向。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

第一，在科技物品层面，移动网络的载体——智能手机在吉村家庭中得到广泛采纳。村民更为看重智能手机在通讯方面的经济优势。与其他媒体设备相比较，智能手机具有明显的、可见的技术可供性。在物品经济性和技术可供性驱动下的智能手机的农村下沉之路具有勾连乡村与城市、地方与国家、传统与现代的结构性意义。另外，移动网络的吉村技术实践具有个体化、定制化和共享体验等特征。这不仅体现在个体手机下载的软件等的差异，也体现在夫妻共享手机等的实践中。

第二,在文本内容层面,社交网络互动、看网络节目、玩手机游戏等成为村民生活中重要的消费内容,但村民的内容消费与既有的家庭权力关系紧密相关,性别角色、亲子关系和家庭分工模式等也反映到家庭成员的移动网络内容消费实践上。另外,移动网络的内容消费与个体生命体验和农村家庭生活紧密勾连。对网络和手机的内容消费和在线表达深深嵌入个体的成长体验,并构成了个体生命的记忆。媒介消费也重塑农村家庭的时间安排和生活习惯,形成基于互联网内容的“网络消费日程表”。

第三,在社会空间场景层面,村民的移动网络消费实践与不同结构性空间场景发生勾连。移动网络实践改变了吉村的农业生产管理方式,形成了农业生产“不在场的空间”。移动网络的实践也带来农村家庭共享空间的式微与“卧室文化”的形成。对于吉村打工或远嫁的村民而言,移动网络复制了他们在家乡的家庭空间和人际网络。外出的村民更愿意花费时间在与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家庭成员和本村村民的沟通上,而难以拓展新的人际网络。从这一场景上看,新技术也有其“旧”的和保守的一面。

另外,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科技物品、符号文本与空间场景的三重勾连之间存在紧密互动和交互影响,三者也是密不可分的。首先,作为第一层勾连的物品与作为第二重勾连的内容间的互动互构关系需要在不同场景(第三重勾连)中考量。不同的媒介技术对应着特定的内容呈现与供给,但对技术和内容的消费离不开社会主体实践的具体场景。在吉村村民看来,与其他媒介相比较,智能手机意味着不必花钱就可以与另一端的亲友互动,意味着更有效率地安排和规划农业生产,意味着海量、易得、任意选择的影音、游戏等娱乐内容,而这些技术与内容勾连的背后具有丰富的农村生产、生活和家庭场景,也体现出吉村家庭在接受智能手机及其内容安排的道义经济学(moral economy)的考量,即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和文化单位,其成员的认知、评价和审美对技术接入与内容消费的界定和预设(Silverstone, 1994: 48)。

其次,移动手机及其承载的内容、文本与具体的乡村社会、文化场景发生勾连,也意味着乡村社会渐进式的变迁。在科技现实主义(technorealism)者看来,科技有其技术特性,但科技必须放置于社会文化场景中使用。科技的应用是技术特性与社会文化互动的结果。“究其实质,就是既注意到科技特性所带来的影响,但又相信经由反思所形塑的社会文化将有助于形成对科技的适切使用。”(黄厚铭,曹家荣,2015)技术在吉村农业生产和蔬菜种植中的使用,对农民休闲生活的改造,对村民消费方式和家庭文化的冲击等,这种日常生活的变迁恰恰是智能手机

（移动网络）的技术可供性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生活场景中被村民对技术承载的内容理解、采纳和使用的结果。

最后，本研究无意提供关于一个村庄的特殊性“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而是认为新媒介技术与吉村社会生活间的勾连具有中国乡村（甚至城市）在新媒体冲击下做出回应和调适的某些共性。这是因为，现代媒体本身具有全球化和同质化的一面（孙信茹，王东林，赵洁，2018）。吉村的移动网络实践是信息传播技术背景下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当然，根据吉村的经验去推断中国其他地区乃至本地其他村庄的移动网络与农村日常生活的具体勾连模式，这显然是荒谬的，这体现出媒介实践“地方性”的一面。然而，一叶知秋，吉村的互联网实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信息传播技术与中国农村勾连的某些层面，包括人际交往、家庭日程、农业生产、文化生活乃至社会变迁。正如周雪光教授（2009）基于对中国某乡镇的村庄选举调研而对中国制度性变迁所做的论断，“我固执地认为中国农村这一角落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它是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大规模变迁的一个缩影。”

（责任编辑：吴欣慰）

### 注释 [Notes]

1. 关于民族志田野地点如何选择的问题，是选择陌生的海外地点、异文化还是选择熟悉的家乡社区、本文化，涉及到学科范式、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伦理和方法论等诸多问题，海内外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有广泛讨论（Leach，1982；郭建勋，2012；王铭铭，2008）。并因此产生了“本土人类学”“家乡社会学”“海外民族志”等工作概念。我们无意于在此问题上争论孰优孰劣，而是赞同无论是做家乡研究还是异乡研究，都应该坚持自我的内省（introspection）（Leach，1982：127），既体现对研究的问题意识的反省（应星，2018），也包含对观察材料和叙述文本的反思性使用。就本研究而言，第一，吉村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规模较大的传统农业村庄，互联网采纳、发展轨迹背后的个体生活和乡村变迁具有广阔的场景特征，包括个体生命史、家庭场景、农业场景、在线场景等特征，能够较好地承载本文所探讨的核心问题。第二，尽管调查地点是本文作者的家乡，但并不意味着作者在调查和写作中没有自己的判断。在研究方式上，作者遵守从经验观察到理论思考再到经验观察的研究方式，在材料的复杂性和理论的简约性间寻找对话和分析张力。在研究立场上，作者希望既能通过被调查者的主位（emic）视角展开叙述，以聚焦事件和还原事实，又希望能通过研究者的客位（etic）角度理论化思考材料背后的核心问题。第三，对于民族志文本的真实性问题，既涉及收集素材的技巧问题，也涉及到人（研究者）的认识如何达到“真实”的问题（陈庆德，郑宇，2006）。本文作者通过访问不同叙事者以辨识材料的真实，包括事件、行为者、时

间和地点等。同时,在对材料阐释过程中,两位作者也独立展开理论思考,并在讨论中达成共识,以期接近民族志的“真实”叙事。

2. “我”在本文中特指本文第一作者,下同。
3. 在计算被调查者年龄时,如无特殊说明,均以2017年减去被调查者出生年份计算。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陈刚,张卉(2009)。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的有关问题研究——从受众的视角重视城乡数字鸿沟。《广告大观(理论版)》,(6),4-8。
- 陈庆德,郑宇(2006)。民族志文本与“真实”叙事。《社会学研究》,(1),140-153。
- 陈云松,朱灿然,张亮亮(2017)。代内“文化反授”:概念、理论和大数据实证。《社会学研究》,32(1),78-100。
- 丁未,田阡(2009)。流动的家園: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16(1),61-70。
- 管成云(2017)。农村网吧里的孩子们——基于湖北省藕镇留守儿童互联网使用与社会交往的民族志调查。《新闻学研究》,(132),1-59。
- 郭建斌(2005)。《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 郭建勋(2012)。田野选点与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传统。《民族学刊》,(6),28-35。
- 郭文平(2014)。新闻文本与科技型式的双重链接:日常生活中网络新闻消费实践的类型研究。《传播与社会学刊》,(27),27-63。
- 黄厚铭,曹家荣(2015)。“流动的”手机:液态现代性的时空架构与群己关系。《新闻学研究》,(124),39-81。
- 金玉萍(2010)。《电视实践:一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柯克·约翰逊(2000/2005)。《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展明辉、张金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刘娟,叶敬忠(2010)。农村互联网的拥有和使用:有关发展的思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7(4),70-78。
- 刘骏,薛伟贤(2012)。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测算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科技管理研究》,32(9),27-30。
- 潘忠党(1996)。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下)。《现代传播》,(5),16-24。
- 邱林川(2008)。信息社会:理论、现实、模式、反思。《传播与社会学刊》,(5),71-99。
- 孙信茹,王东林,赵洁(2018)。作为意义探究的田野笔记——媒介人类学“实验性文本”



- 的实践与思考。《新闻记者》，(8)，75-84。
- 王铭铭(2008)。由彼及此，由此及彼——家乡人类学自白(上、中、下)。《西北民族研究》，(1、2、3)。
- 魏然(2015)。新媒体研究的困境与未来发展方向。《传播与社会学刊》，(31)，221-240。
- 杨蓓蕾(2006)。对缩小我国城乡“数字鸿沟”的若干思考。《社会主义研究》，(3)，53-56。
- 杨国斌(2017)。中国互联网的深度研究。《新闻与传播评论》，(1)，22-42。
- 应星(2018)。“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社会》，(1)，30-53。
- 赵靳秋，郝晓鸣(2006)。农村互联网技术的扩散。中国传播学论坛。
-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9年2月28日)。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 2019年7月24日访问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yzbg/hlwtjbg/201902/t20190228\\_70645.htm](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yzbg/hlwtjbg/201902/t20190228_70645.htm)。
- 周雪光(2009)。一叶知秋：从一个乡镇的村庄选举看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社会》，9(3)，1-23。
- 周裕琼(2014)。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对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的量化考察。《现代传播》，(2)，117-123。
- Bakardjieva, M. (2005). *Internet society: 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 Sage.
- Basu, T. & Banerjee, S. (2011). Impact of Internet on Rural Development in India: A Case Study. *Amity Journal of Media & Communications Studies (AJMCS)*, 1(2), 12-17.
- Bovill, M. & Livingstone, S. (2001). Bedroom culture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media use. In Bovill, M. & Livingstone, S. (Eds.). *Children and Their Changing Media Environment: A European Comparative Study* (pp.179-200).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Chitnis, K., Kim, D. K., Rao, V. & Singhal, A. (2007, May). *Internet, sanchalak, and e-Choupal: connecting rural Indian farmers to urban marke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CA.
- Courtois, C., Mechant, P., Paulussen, S. & De Marez, L. (2012). The triple articulation of media technologies in teenage media consumption. *New Media & Society*, 14(3), 401-420.
- Courtois, C., Verdegem, P. & De Marez, L. (2013). The triple articulation of media technologies in audiovisual media consumption. *Television & New Media*, 14(5), 421-439.
- Dutton, W. H. (Ed.). (2013).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et studi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nt, E. S., France, R. B. & Hsu, S. (2000). Towards an Internet-based Education Model for Caribbean Countrie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25(1), 21-30.

- Gunther, A. C.& Schmitt, K. M. (2004). Mapping boundaries of the hostile media effec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4, 55-70.
- Haddon, L., & Silverstone, R. (1996).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young elderly*. Falmer, UK: University of Sussex.
- Hartmann, M.(2006). The triple articulation of ICTs. Media as technological objects, symbolic environments and individual texts. In Berker, T., Hartmann, M., Punie, Y. &Ward, J. (Eds.). *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 (pp.80–102). Berkshire,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LaRose, R., Strover, S., Gregg, J. L.& Straubhaar, J. (2011). The impact of rural broadband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a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8(1), 91-100.
- Larson, R. W. (1997). The emergence of solitude as a constructive domain of experience in early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68(1), 80-93.
- Leach,E.(1982). *Social Anthropology*. Glasgow, UK:Fontana paperbacks.
- Livingstone, S. (2002). *Young People and New Media: Childhood and the changing media environment*. London, UK: Sage.
- Livingstone, S. (2007). On the material and the symbolic: Silverstone’ s double articulation of research traditions in new media studies. *New Media & Society*, 9 (1), 16–24.
- Morley, D. & Silverstone, R. (1991). Communication and context: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the media audience. In Jankowski, N. W., & Jensen, K. B. (Eds.).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pp.149-162). London, , UK: Routledge.
- Nagy, P., & Neff, G. (2015). Imagined affordance: Reconstructing a keyword for communication theory. *Social Media+Society*, 1(2),1-15.
- Neiger, M., Meyers, O. &Zandberg, E. (2011). On media emory: editors’ s introduction. In: Neiger, M., Meyers, O. &Zandberg, E. (Eds). *On media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 ( pp.1-24) .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Oreglia, E. (2015). The “Sent-Down” Internet: us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rural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1), 1-6.
- Rimal, R. N., Chung, A. H., & Dhungana, N. (2015). Media as educator, media as disruptor: Conceptualizing the role of social context in media effec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5(5), 863-887.
- Rogers, E. M. (1983).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3th ed.).New York, NY: Free Press.
- Silverstone, R. (1994).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UK: Routledge.
- Silverstone, R. & Haddon, L. (1996). Design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echnical change and everyday life. In R. Silverstone, R&

- Mansell, R. (Eds.). *Communication by design: The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pp. 44–7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lverstone, R., Hirsch, E. & Morley, D. (1991). Listening to a long conversation: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home. *Cultural Studies*, 5(2), 204-227.
- Takenaka, K., Bando, T., Nagasaka, S., Taniguchi, T. & Hitomi, K. (2012, October). *Contextual scene segmentation of driving behavior based on double articulation analyzer*. Paper in Intelligent Robots and Systems (IROS), 2012 IEEE/RSJ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p. 4847-4852). IEEE.
- Taniguchi, T., & Nagasaka, S. (2011, December). *Double articulation analyzer for unsegmented human motion using pitman-yor language model and infinite hidden markov model*. Paper in System Integration (SII), 2011 IEEE/SIC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p. 250-255). IEEE.
- Vorderer, P., Krömer, N. & Schneider, F. M. (2016). Permanently online–Permanently connected: Explorations into university students’ use of social media and mobile smart devic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3, 694-703.
- Yang, G.& Wu, S. (2018). Remembering disappeared websites in China: Passion, community, and youth. *New Media & Society*, 20(6), 2107-2124.